

一门从田野到田野的学问

冯骥才

博古知今

非遗学不是高高在上、坐而论道的学问，不能把学问搬到书斋里做，而要“把书桌搬到田野”。

我国非遗的体量、规模、复杂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由于非遗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每一项非遗都各具特色，对其传承和保护的方式也必然各不相同，科学管理急需非遗学提供学理支撑。

非遗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都是民间文化，有人便把非遗学与民俗学、民间文化等同起来，但它们不能等同。民俗学从田野出发，但并不必须回到田野；非遗学却必须回到田野。非遗学是为田野工作的学科，这是它的特性，也是它的学术使命。

被田野“逼”出来的学问

严格地说，“非遗”一词直到本世纪初才出现，它源自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遗来自民间文化，但不是民间文化的全部，而是从民间文化中遴选出来、具有代表性并保持活态和必须传承的精华部分。非遗是强调“遗产”意义的，而民间文化学和民俗学不强调“遗产性”。从学科上说，民间文化学与非遗学更是不同，不论是学术立场、学术使命、学术目的或关注点等，非遗学都有其特殊性。

首先，“非遗”的概念是时代的产物，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对前一个历史时期非物质的文化创造在认知

上的自觉。这种自觉是一种文明的觉醒，使人类的文明观和遗产观都向前迈出重大的一步。

当然，非遗一出现，就遇到了时代的巨大挑战。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更替势不可挡，而我们必须传承的珍贵的非遗正在被时代更替的事物之中。所以，非遗工作伊始，首先要对非遗进行全面的“紧急抢救”，进行抢救性的记录、整理、分类，甄选精华，进而保护。

这件事很难。因为非遗是一种田野文化，是大众为了满足自己而集体创造的生活文化。它与庙堂文化和精英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庙堂文化与精英文化有文字著录，记载清晰，传承井然。民间文化则像野草山花那样遍地开放，兴衰枯荣，一任自然，很多从无著录，也无文字记载。当我们开始对神州大地的非遗进行地毯式调查时，才知道民间文化种类之繁多，特色之缤纷，内涵之迥异，难以穷尽。不管跑过多少地方，对于田野的文化，我们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得多。由于我国地域广大、山水相异、民族众多，非遗更是灿烂无比。现在列入政府四级（国家、省、市、县）名录者已多达10万余项，仍然时有新的发现。

更大的难题是，对于如此超大规模、极其庞杂、千头万绪的民间文化，怎样去确认、记录、分类、整理和甄选？历史上，非遗从来没有进入过遗产名单。没有前人的经验可资借鉴，更没有专业理论可做指导，甚至没有相关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认知，只有浩如烟海、处于濒危的民间文化，在田野里等待我们去援助。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挑战。

如今，社会各界愈来愈多地关注非遗，支持非遗；特别是学术界，致力于非遗的知识构建与理论构建，给非遗事业以必需的学理支撑，助力了从国家制定非遗保护法到政府建立各级非遗名录、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等一系列非遗管理制度和保护方式的确立。

我国的非遗保护和管理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事物愈是发展，深层问题就出现得愈多，对学术能力的要求就愈高，对理论健全的要求就愈迫切。这些压力都压给了新兴的学科——非遗学。

所以我们说，非遗学是被田野“逼”出来的。一切问题都是田野提出来的，图书馆里没有答案；凡是要为非遗学立说者，还要问道于田野。

在田野建构的学科

非遗学的性质由非遗本身决定。

非遗对非遗学的要求，首先要让当代人从遗产角度（这是从未有过的角度）来认知它，阐明它的重要性、价值、内涵，明确它的特性，进而还要将每一项非遗的文化构成厘清；再进一步便是要关切非遗的传承方式、传承内容和传承人。这些世世代代在田野中自生自灭的东西，都是今天非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非遗学所关注的这些问题，都是过去不曾关注的，是以往学术的空白。

一是非遗的技艺传承。技艺是非遗的关键，它世代活态地保存在传承人的身上，是非遗的生命。认知技艺的价值、确定技艺的精髓、厘清传承的脉络、制定技艺的保护标准，是非遗学者的重要工作。

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传承，传承是非遗学的核心内容。

二是保护。这也是非遗学的重中之重。此前，民间文化是完全没有保护的。保护缘自人类对自己创造的历史文明的自觉和责任。但仅有保护的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知识和方法，需要对非遗的正确认知和对保护方法的科学设定，以及严格的监督保障。这些工作都必须在田野中进行。

从对非遗的认识、概念的确认到知识体系的构成，从遗产的记录到传承保护的观念和方法，都是来自田野，都是田野迫切的需要。非遗学不是高高在上、坐而论道的学问，不能把学问搬到书斋里做，而要“把书桌搬到田野”。能够回答我们“非遗之问”的，不是书本，而是生气勃勃又问题多多的田野。从一项项具体的知识，到这门学问所有重大的疑难，只有在田野里才能找到答案。

非遗学直接为非遗服务，我们从不回避这门学问的应用性与现实性。非遗学为田野文化构建理论，为遗产的跨时代传承排忧解难，是既切合实际，又贯通古今，并且事关久远的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非遗学是一门具有文化责任的学问。

接受田野检验的科学

非遗学的一切成果，最终都要接受田野

的检验。没有人可以评价它的是与非，只有田野能够显现它的成与败。

比如，如果我们的保护理念错了，方法错了，某些非遗就可能因之消亡；如果我们的保护理念科学到位，那些非遗便会赓续有序，优秀的传统得以保持和发扬。

再比如，如果我们对非遗的认知有限，自以为是地误导了传承人，让充满着乡土气质和地域精神的传承人将千百年代代相传的看家本领扔掉，将自己最重要的“民间审美”视为落后和低下，非遗就会变异变质。看上去传承还在，但非遗的“原生态”却不翼而飞，名存而实亡。这是非遗学者必须关注的。

我们的理念、见解、判断、措施正确与否，只有田野说了算。决不能把想当然的思想方法与指导方案一味地推行下去，糊里糊涂涂了若干年之后，却在现实中找到非遗最珍贵的本色了。这是非遗学一个要害的问题，我们不能让非遗得而复失。

这就要求在管理层面上，应保有严格的监督和科学的检验机制。非遗学者要为监督与检验制定标准。这也是非遗学者一项专业性和学术性很强的工作。

从田野中出发，在田野中探索，在田野中研究与创建，再回到田野接受检验，这便是非遗学这门学问的全过程。

作为新兴学科的非遗学，任务繁重。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每一个专用名词的确立、每一个概念标准的阐释、每一项学术内容的确定，直到整体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搭建，全是由无到有。

非遗需要系统化、档案化和整体的科学管理。我国非遗的体量、规模、复杂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由于非遗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每一项非遗都各具特色，对其传承和保护的方式也必然各不相同，科学管理急需非遗学提供学理支撑。

工作再多，也都要从田野做起，而且一直都不能离开田野。学术无论巨细，都要做到精到深透。非遗学是一门永远跋涉于田野的学问，惟其如此，才能成为中华大地非遗保护与发展的科学支柱。

（作者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

版式设计：蔡华伟

足音

李仰松：

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开拓者

赵春青

由李仰松指导的洛阳王湾遗址的考古发掘，成功揭示了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转变的过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仰松，是考古学界和民族学界公认的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考古文博学院每年都要请李先生来给本科生上一课，讲自己的考古学之路。每年在特定的节日，学院高年级学生到畅春园看望李先生，成为雷打不动的惯例。已逾鲐背之年的李先生是学院一“宝”。

1950年，18岁的李仰松从陕西省华县咸林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博物馆专修科（后来并入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1954年，李仰松留校任教，担任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与民族学家林耀华所开新石器时代考古、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两门课程的助教。林先生是民族学界的学术权威，或许正是受他影响，李仰松日后对民族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最终成为民族考古学家。

2022年庆祝北京大学考古百年，新中国考古专业教育70年时，李仰松和严文明、原思训、李伯谦、赵朝洪等几位先生一起接受教学贡献奖。

在3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差不多每隔一年李仰松就要带学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在西安半坡、洛阳王湾、郑州二里冈、濮阳西水坡等遗址，都留下了李仰松的身影。由李仰松指导的洛阳王湾遗址的考古发掘，成功揭示了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转变的过程，终结了关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早晚关系的长期争论。李仰松执笔的《洛阳王湾：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成为他的考古学重要成果。“我所研究的课题，若涉及仰韶文化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文化习俗，首先使用的一把标尺是半坡遗址，若涉及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课题，就使用青海贵南杂马台墓地这把标尺，若涉及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课题，就使用江西清江筑卫城遗址这把标尺，因为我曾经参加、主持过这些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掌握第一手资料，心中有底，不会是纸上谈兵，不会太离谱。”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和学问之道。

20世纪50年代，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等遗址的考古工作，在田野考古实践中均进行了重建古代社会的探索。在考古发掘中碰到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一些现象，如何科学解释？当时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比较缓慢，是很好的参照。1956年，配合中央民委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云南分组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李仰松来到云南西盟佤族村寨，详细调查当地居民的原始制陶、谷物酿酒等。制陶工具及其用途、陶土来源、制陶步骤、烧陶过程、陶器种类与纹饰、价格和销售地等各个环节，他均进行了仔细观察和记录，撰写成《云南省西盟佤族制陶情况》和《我国古代陶器制作上的几个问题》。过去有人提出，仰韶文化篮纹陶上的篮纹，是用编好的篮条印上去的，李仰松的调查否定了这一说法。如今，仰韶文化陶器的纹饰系拍印而成，已成为毋庸置疑的铁论。

1973年，李仰松完成了《原始社会与民族志》试用讲义。20世纪80年代末，李仰松率队前往云南西北的独龙族、傈僳族、普米族、怒族和纳西族等民族聚居地进行民族考古调查。依据我国独龙族、高山族人们使用双连杯举杯共饮的习俗，他将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双连壶解释为一种双人共饮时使用的酒器，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李仰松在云南独龙族调查时，对当地交通不便的体会十分深刻。回到北京之后，他与林耀华、杨堃等10余名著名民族学家联名写信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这一地区的交通困境。后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结束了独龙族人世世代代没有公路的历史。

20世纪90年代初，李仰松已近退休之年，仍带领研究生前往海南黎族和苗族地区进行民族考古学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在李仰松的心中，考古工作和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他也不断把做学问的真谛传授给学生。



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双连壶。河南博物院供图

殷墟博物馆新馆

系统展现商文明的面貌

岳占伟



殷墟博物馆新馆“子何人哉——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特展”。

岳占伟供图

讲述商代复杂的社会结构。通过考古，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商代社会结构：商王通过占卜等手段，借神权彰显王权；贵族地位崇高，担任不同等级的官职，在族邑及王朝内部拥有一定话语权；人数众多的平民构成了社会的基础，并通过制礼作乐来规范社会秩序。在殷墟博物馆新馆，从平民到商王，不同等级的墓葬随着地势与台阶从低到高复原展示，结合墓葬内出土的全部文物的整体展示，直观展现了商代社会各阶层的差别，再现了各阶层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

展示商代丰富的社会生活。持续的考古发掘为我们复原商代先民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可能：播五谷，铸青铜，重生产，重贸易，手工业生产技术得到极大发展。“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商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坑的集中展示，再现了商代的祭祀场景。“车辚马萧萧”展厅，集中展示了25辆

商代马车，车马矩阵再现了商王田猎出行、征战四方、驰骋千里的壮观场面，展示了马车作为交通工具在商人社会生活、礼乐制度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殷墟是中国青铜文化鼎盛时期，青铜器造型精致，纹饰繁缛，工艺精湛。博物馆设置铸铜作坊实景，结合文物组合展示，将铸铜工具刻刀、铸造器具陶模、范、芯、熔铜器具炉壁与坩埚，打磨器具磨石等文物，与铅铋窖藏坑相结合，完整呈现了商代青铜器生产流程，反映出铸型工艺的规范化和复杂化；又在实景内设置触摸屏，让观众体验在青铜器模型上粘贴纹饰等，增强了互动性和趣味性。

勾勒商代文化的交融与借鉴。“四海来假，来假祁祁”，王畿与周边诸侯方国不断进行文化交流与交融，不断丰富着商文明。在博物馆四方交流的展线上，有许多陶鬲。陶鬲系炊器，在殷墟发现了许多非本地生产的陶鬲，它

们是诸侯方国的人们从自己家乡带来的，如来自晋陕高原的花边口沿袋足鬲，来自山东菏泽地区的宽沿方唇鬲，来自湖北毛家咀遗址的“羊角”鬲，等等。此外，殷墟遗址还出土了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硬陶器和原始瓷器，来自北方草原地区的兵器、车马用具等。殷墟文化正是在吸纳融合四方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才得以形成“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这也是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内在因素。

鼎是商代重要的青铜礼器。殷墟博物馆新馆以青铜方鼎为其外形，四面采用草坡进行掩护，使其很好地融入殷墟遗址。博物馆外墙上部纹饰采用了青铜器上最常见的三大主题纹饰和装饰手法，以云雷纹为地纹，兽面纹和夔龙纹凸起于地纹之上，层次感强。博物馆大门门楣上的“天邑商”三字，来自殷墟甲骨文。在步入博物馆大门之前，我们可以给游客讲“天邑商”的由来：因为殷墟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荣的城市之一，所以商朝人自豪地称自己的都城为“天邑商”或“大邑商”。站在博物馆大厅抬头仰望，玄鸟正在空中盘旋，这就是《诗经》中“玄鸟生商”的美丽传说。

殷墟的发掘与保护，离不开一代代考古人的坚持与传承。基本陈列“探索商文明”讲述了从1928年董作宾铲起第一锹土开始，到李济、梁思永等第一批中国考古学家15次科学发掘殷墟宫殿区、王陵区，再到上世纪50年代起安志敏、郑振香、杨锡璋、刘一曼、唐际根等考古学家发掘殷墟众多区域及洹北商城的过程。近百年的上下求索，基本建立了商代考古编年体系，厘清了殷墟整体布局，深化了族邑形态和性质研究，拓展了手工业布局与技术研究……

博物馆与殷墟宫殿宗庙区仅一河之隔，是殷墟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殷墟考古遗址公园内持续的考古，“大邑商”面貌不断被揭示，商文明内涵不断被丰富。（作者为殷墟博物馆执行馆长）

呈现殷墟大邑商总体布局。殷墟东西6千米，南北超过5千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千米。其中，洹河以北分布着商中时期的洹北商城，小屯一带为商王的宫殿宗庙区，侯家庄西二冈为王陵区和祭祀场。商人采用族邑模式，在王族邑的周围，分布着其他众多家族聚居的族邑、手工业区等。干道、干渠及其支渠，为都邑的骨干框架。博物馆通过立体沙盘与视频、互动屏相结合的方式，将殷墟布局从开始到兴盛，族邑逐渐增大、增多的变迁历程如画卷般展开，生动呈现2500余年大邑商都邑变迁史。